

多舛之作：文革前夜 周恩來與電影《李善子》

• 張濟順

摘要：《李善子》是1963年初周恩來親自提議、精心部署並全程指揮拍攝的電影，改編自同期演遍中國的朝鮮話劇與影片《紅色宣傳員》。電影的改編拍攝始終充滿外交與內爭的共振與張力，阻障不斷，進退維谷。終因中、蘇、朝關係的變化，國內文化大革命將至，攝製完成的影片未得通過，入庫封存。本文立足檔案、回憶錄等多種來源文獻的辨析互補，揭示電影生產的政治意涵。在《李善子》攝製過程的背後，凸顯出文革前夜周恩來與柯慶施、文藝界和上海電影人的關係，以及文化交流名義下中朝之間彼此糾纏的複雜經驗。

關鍵詞：周恩來 柯慶施 「大寫十三年」 中朝關係 《李善子》

在中國電影史上，1965年攝製完成的《李善子》是眾多失聲的影片之一。一部電影沒有在史上留名本不足為奇，哪怕它出自鄭君里和張瑞芳兩位名家之手。然而，這部由周恩來親自提議、精心部署、全程指揮，耗時兩年零八個月攝製完成的電影，卻進了中國電影資料館，至今未得見光，謎障重重。

迄今為止，未有關於《李善子》的專題論著問世，唯見畢克偉 (Paul G. Pickowicz) 關於鄭君里的論文稍有提及^①。這項研究旨在探討這位前私營電影藝術家與社會主義文化的「共謀」關係，主要分析素材是其系列作品，將電影文本作為一種文化呈現，揭示背後政治與藝術的權力交錯與博弈。基於問題域、研究路徑以及史料源，《李善子》並不是畢文最主要的分析例證，就電影本身而言，他只告訴我們，周恩來親倡的這部改編自朝鮮話劇、歌頌金日成的影片，毀於江青一句「看了滿身疼」的咒語，由此揭開鄭君里悲劇命運的序幕。

* 本文寫作與修改得到鄭大里先生、沈志華教授、韓鋼教授的幫助，兩位匿名評審人的指導，特此致謝。

筆者閱檔偶得，發現《李善子》價值遠超出畢文的研究問題，值得探究之處不只在電影本身，而在電影生產背後波譎雲詭、起伏跌宕的政治大劇。導致《李善子》悲劇結果的，也遠不止江青的一句咒語。本文立足於檔案、回憶錄等多種來源的文獻辨析互補，尤其注意不同材料記錄者的立場與語境，盡力還原《李善子》政治運作的歷史場景。通過對這一事件的詳考，揭示文化大革命前夜的周恩來與柯慶施、文藝界和上海電影人的關係，以及文化交流名義下中朝彼此呼應牽制、碰撞較量的複雜經驗，以期為文革前史提供一個多重維度的案例，也為近年中朝關係的開創性研究^②，伸展一個文化交流的視角。

一 始於京城的紅色旋風

1962年12月29日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（北京人藝）在首都劇場公演朝鮮話劇《紅色宣傳員》（以下簡稱《紅》）。該劇演出陣容強大，著名戲劇藝術家歐陽山尊執導，北京人藝名家齊集登場。千餘人參加的開幕儀式極為隆重，中方有國家副主席董必武，副總理陳毅、陸定一等到場；朝方出席的是朝鮮文化藝術代表團、駐華大使和夫人以及使館全體人員。翌年1月，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，政治局候補委員、書記處書記康生，書記處候補書記楊尚昆等接見朝鮮代表團並觀看演出。此後，各地競相排演《紅》劇，並作為「重點劇目」推出，還被各個地方劇種移植，各路名家紛紛領銜主演，颯起了一股「朝劇」旋風。

全國各地一轟而上地演一齣戲，並四處移植，從1960年代起就成常態。始於北京的《紅》劇演出熱潮中，「滬版」關注度異乎尋常，不但上海媒體競相宣傳，1963年2月3日的《人民日報》還專門發布上海排練的消息，並稱著名電影演員張瑞芳即將出任主角李善子；同年《上海戲劇》第4期幾乎是《紅》的專刊，滬上文化官員和文藝界盛讚「滬版」《紅》劇，高度評價張瑞芳的表演^③。

初看起來，滬版《紅》劇大獲成功，是得益於上海電影演員劇團（上影劇團）演員張瑞芳的「紅色明星」效應。《紅》公演前一年，上海海燕電影製片廠（海燕廠，上海電影製片廠〔上影〕下設兩個故事片廠之一）拍攝的由張瑞芳主演的農村喜劇片《李雙雙》在全國公映，反響熱烈。然而，從「李雙雙」到「李善子」完全出乎張瑞芳意料，後者不是上影劇團原定的演出劇目。

1962年秋，張瑞芳被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借調，參加著名劇作家、上影首任廠長于伶的話劇新作《七月流火》的排練，擔綱女主角。該劇以中共地下黨員、抗日英烈茅麗瑛為原型，描寫孤島時期上海職業婦女俱樂部主席華素英，在組織婦女開展義賣募捐的活動中，慘遭汪偽特務暗殺的故事。《七月流火》一經發表，十二個省市話劇院團同時排演。正在緊鑼密鼓的排演與電影籌劃之際，1963年初突發變故。1月8日，周恩來電示張瑞芳撤出《七月流火》劇組，馬上回上影劇團排演《紅》劇，扮演主角李善子，並要將《紅》劇改編成中國的彩色影片。張瑞芳對此很不解，但沒等她提問，電話就「匆匆掛斷」^④。

張瑞芳是民國時期知名的影劇明星，她的另一個特殊身份是「三八式」的中共黨員。1938年入黨後，組織關係直屬周恩來，建國後仍得周恩來夫婦多